

March 2013

The Word Order in the Collective Titles for Author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Shijin Lu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uo, Shijin. 2013. "The Word Order in the Collective Titles for Author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2): pp.77-8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2/2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

罗时进

摘要: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如何并称,关乎语言符号秩序,而并称现象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论意义。如果说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阐释就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其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 并称 唐代作家 语言秩序 评论价值

作者简介: 罗时进,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电子邮箱:13812795169@126.com

Title: The Word Order in the Collective Titles for Author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group writers under a collective titl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phenomenon, as well as how to group the authors and in what order to call them, is meaningful to literary criticism. As the collective titles are highly acronymized or very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de-acronymizing and origin-seeking becomes an approach of interpretation, during whic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authors' achievements may help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Collective titles hav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me authors have entered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and become representative of a period, while some elapsed into oblivion. No matter what reasons may lie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grouping different authors with a collective title is worth academic atten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ly title authors in the Tang Dynasty word order in a name critical significance

Author: Luo Shijin,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lassical Literary Resources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Society of Tang Literatur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after Tang Dynasty and the studies of area and clan literatures. Email: 13812795169@126.com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曾引起过学界较多的讨论,不少学者从生成和接受的角度提出过灼见,这一问题上的许多知识点都得以厘清,其学术意义也基本得以揭示。^①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一话题,是试图在整体性学术视阈中对唐代作家并称现象的承衍与影响,以及其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进行一些梳理,使这一别具特色的文论形式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一、“并称”之概念界定及唐代文人并称表达的承衍

并称,是一种将可以等量齐观或具有某种特殊关联的人物、事物、事件、地域、自然现象等并举列示的称谓形式。^②本文的作家并称,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文人加以复合列示的方法,一般具有符号表征、连类聚合和数量限定三方面特点。

符号表征指并称通过对姓氏名号加以减省化,按照一定特征和语言表达要求,提炼出具有代

表性要素作为并举成分。没有经过减省而形成简明符号表征的一些完整姓名(字号等)的组合列举,是泛义并举,不应作为并称看待。^③

连类聚合指并称属于多个人物连类展现,列举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属类和依存关系,其组类的某种抽象或具体特性,具有可比性;聚合标目,突出比类因素,其匹耦的语感,精粹的表达,能够为人注意,便于传播知闻。

数量限定,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无论何种并称,在数量上都是明确的,没有模糊的边际;二是有些并称是直接以限定数量词加相应端语的形式出现(其变化形式是特征性词头加数量词,复加端语);三是其并示之数量,一般是总量中的代表性部分,而非全部,与统称有一定的区别。

为了清楚地说明并称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八《谈丛四》所云:

唐人一时齐名者,如富、吴(嘉谟、少微),苏、李(前味道、峤,后颢、父),燕、许(燕国公张说、小许公苏颢),萧、李(颢士、华),韩、柳(愈、宗元),四杰(王、杨、卢、骆),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称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绅),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沈、宋(佺期、之问),钱、郎(起、士元,时人语“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又钱、郎、刘、李(合刘长卿、李嘉佑称之,亦时人语),鲍、谢(防、良辅),元、白(稹、居易),刘、白(合刘禹锡称),温、李(商隐、庭筠),贾、喻(岛、晁,出顾云文),皮、陆(日休、龟蒙),吴中四士(贺知章、刘眘虚、包融、张旭,一云无眘虚,有张若虚),庐山四友(杨衡、符载、崔群、宋济),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张仲素),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李端),咸通十哲(许棠、张乔、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实十二人)等目。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胡震亨 288)

胡氏在这里列举了若干唐代重要文人的并称,包含了姓氏并举、数量词加端语、特征性词头

加数量词,复加端语等各种表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个并称之后,胡氏都详实地注出了并称者的名字。这恰恰可以看出,真正的并称是仅取姓名中的一个代表性要素的,这种要素的摄取,正是符号性的确认。所谓“兼以文笔为称”、“专以诗称”,是比类的说明,而“时人语”,则是从传播知闻的角度强调其代表性。形成对比的是胡应麟在《诗数·外编》卷三中有云:“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并称者甚众,而不能如汉、魏烜赫。至祖孙相望,则襄阳之杜,亦今古所无也。世所共知二贾、二苏、三王、五窦外,他或以爵位勋名掩之”(胡应麟 167)。这里的“二贾、二苏、三王、五窦”,明确号为“并称”,而其后胡应麟用大量篇幅详细列举了父子、兄弟、祖孙、夫妻各类能诗者的姓名,间有议论说明,显然那些没有符号化的列举,只能看作叙述、评论文字,充其量可作“并论”,而不宜作为“并称”,否则“并称”就被泛化,反而失去自身的特点了。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意识和文体形式的确立到中古时代才逐渐实现,而“文笔不分”的历史相当漫长,因此我们推原文学家并称之始,应当回到更远的历史中去。当然,先秦时代严格意义上的人物并称并不多见,即使司马迁时代,“五帝”、“三王”、“管晏”之类的并举似乎还属于非自觉的表现。《汉书》中,情况已有所变化,不仅有“匡张孔马”这类多个历史人物的并举,而且“宣元六王”、“两龚”式的概括列举形式也出现了,显然人物并称在逐渐走向自觉。随着中国文化至两汉后期完成了儒家经典从神话走向圣化的过程,“周孔”、“孔孟”、“孔颜”作为典型称谓赫然出现了,这对文学人物并称无疑具有范式意义。至魏晋时期,作家并称就屡见不鲜了。有学者提出:

两个或多个作家并称,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其滥觞则始于汉末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相互标榜和月旦人物时的简称。后汉之世,即有“三君”、“八俊”之目[……]早期的并称,包括竹林七友、贾谧二十四友之类在内,其意义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而随后出现的一些并称,其意义就渐渐地指向了文学层面。例如,钟嵘《诗品》中提到的“三张、二陆、二潘”之类,就是着眼于文学的并称。[……]总之,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

的文学批评方式,它是从世族人物品藻中流转而来的。(刘跃进 166—67)

这一论述将人物并称现象与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与标榜月旦风气结合联系起来考察,极具识见,只是其“滥觞”可溯远源。正如青年学者张珊所说:“并称是汉语言乃至汉语文化圈中独特的人物表述方式,以一个词语来统括多人的称述法在先秦即已出现,汉魏之际,则是当世人物并称的正式形成阶段,南北朝时,并称这种称谓方式已经完成了向指称普通文士的扩展”(张珊 155)。应当进一步说明的是,作家并称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绝不是孤立的,是整体文化语境发展的结果,其中文化史上“诸子”、“百家”、“六艺”、“五经”等概念的提出,其义或指向人物,或指向文本,或指向教育科目,都对后来的作家并称提供了言说的示范。特别是汉代今文经学大兴,不仅《五经》被奉为国家学术,且设立了官方的“五经博士”,凡此都对抽象经典化的语言表达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文人并称惯习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历史上最早得到并称的作家是谁呢?古人有认为“苏李”者,如《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欧阳修等 5751)。清人田雯说:“自苏、李以来,古之诗人各有匹耦”(694;卷一)。所谓“苏李居前”、“苏李以来”是指历史上所谓的“苏李诗”,而其伪托之嫌从颜延之、刘勰到顾炎武等众多学者都已发疑并证实。“苏李”并称,影响甚大,但毕竟虚妄,后人其实多半是作为语典使用而已。^④

《后汉书·郎凯传》有“通游夏之艺,履颜闵之仁”语,前半句是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句剥出来的,但这里的“文学”之意与“文献”相通,故“游夏”尚不能作为文学作家之并称看待。^⑤比较可靠的例证还是应回到专门性的文论中去考索,曹丕《典论·论文》有云: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琰、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

这里先逐一列举文学作家,继而以“七子”概称,是“建安七子”或“邺中七子”的原始出处。文学史上后来大量的“XXX子”(或“士”、“杰”、“俊”、“英”、“友”等)皆滥觞于此。《论文》中还有“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雋也”,“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之评论,其中“张蔡”、“琳瑀”、“扬班”显然已经是正式的文人并称了。相沿而下,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虽然“唐虞文章”(《原道》)实在虚渺,但“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辨骚》)、“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诠赋》)、“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章句》)、“扬马张蔡,崇盛丽辞”(《丽辞》)等等,则无疑是对文学家创作地位、风格、承衍的高度概括,其并称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对后代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作为文学家最早得到组类并称的应属“屈宋”了。稍后《昭明文选》编撰行世,其评衡文学及其作家的基本观点与曹丕、刘勰大体一致,这正形成了唐代文学家并称表达的承衍背景和知识基础。

二、唐代文学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

唐代文学家并称,主要是以姓氏为符号,因此并称方法多为“以姓连举”。强调“姓”的代表性,与父系宗族在宗法制社会中的地位有关。“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⑥最初的“姓”乃缘政治需要而生,春秋以后经由“编户”、“齐民”之转变,“姓”逐渐成为血缘团体——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的代表符号。战国至两汉,独立的个体小家庭变得相当普遍,人们对社会上个人的评价也主要与其血缘家庭相联系,因而“姓”理所当然地具有了家庭徽号的意义。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群辅录》(托名陶潜)中的材料。该书主要是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的事迹载录,其中既有对“八顾”、“七辅”、“四友”之类异姓上层政治人物的关注,也有对血缘家庭之名人进行观照的特殊视野,如曰:

右郡决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号曰“五龙”。各居一里,子孙并以儒素退让为业,天下著姓。见《周氏谱》及《汝南先贤传》。(陶渊明 582)

周燕乃西汉中晚时代人,由此可知汉代家族

谱牒已经相当流行,而且其中已有兄弟并称的记载,这是“姓”在社会评价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例证。由此我们对西汉中后期歌谣谚语中“萧朱结绶,王贡弹冠”,“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这类连接人物姓氏而并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而东汉党锢之祸中“李杜”、“许郭”之并称,几乎可以看作人物并称的社会惯习和某种通行规则的产物。

所谓“通行规则”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秩序。那么,回到唐代文学家并称上来考察,是否存在着某种秩序呢?让我们还是从人们熟悉的“初唐四杰”的公案说起。《旧唐书·杨炯传》载: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刘昫等5003-5004)

《朝野僉载》卷六:

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张鷟141)

关于四人并称,历来有“唐初四杰”、“垂拱四杰”、“唐初四子”、“垂拱四子”、“四才子”等以数量词连带端语的称谓,将他们并誉为唐初的代表性诗人,这自无争议。当时和后代有关“四杰”并称的评论洋洋决决,其中不少论述都集中在并列中的排序问题上,而因为有当事人“自道”和当时人“他评”的记载,故成为争论的焦点并衍为公案。

我颇怀疑张鷟《朝野僉载》这本“琐尾槌裂,且多媒语”(洪迈113;卷十二)书中的记载,“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的句法格式完全从“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上套用过来,而且前言后语似乎思理不清,如果不是杜撰之语,便可能是耳食之言。

即使《旧唐书》所载当时文坛名宿之论似乎言之凿凿,而对照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之记载,亦难以相信其果有“(杨)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的说辞。只是从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的叙述,以及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的评论,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相信在唐初至开天之际,“王杨卢骆”是对四杰比较通行的并称排序。

这一言说秩序的依据是什么呢?对此从文学成就或年齿顺序等方面去讨论,并不得要领。宋人范正敏《通斋闲览·杂评》中记载了王安石一段“唐人并称无关优劣”的议论可以参考:^①

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哉?

盖汉之世有李固、杜乔者,世号“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谓之“李杜”,当时甫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谓“李杜”,取其称呼之便耳。退之诗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尝读李白、杜甫诗”,则李在杜先。若曰“远追甫白感至诚”,又曰“少陵无人谪仙死”,则李居杜后。如此则孰为优劣?如今人呼其姓,则谓之“班马”;呼其名,则谓之“迂固”。先时白居易与元稹同时唱和,人号“元白”;后与刘禹锡唱和,则谓之曰“刘白”。居易之才岂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杨卢骆”,杨炯固尝自言:“余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益知称呼前后不足以优劣人也。晋王导尝戏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驴马,岂驴能胜马邪?君若泥称呼以为优劣,将复有以此戏君者矣!”或者又曰:“评诗曰谓甫期白太过,反为白所谓。”公曰:“不然。甫赠白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诗又在庾、鲍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

值得注意的是,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中有关并称的论述,除了重复了王安石的“取其称呼之便”说外,还提出了一个“适齿牙”的概念:

凡词场称谓,要取适齿牙而已,非必在前则优,居后为劣也。屈、宋、曹、刘之类,固云中的。诗称苏、李,岂苏长于李乎?史称班、马,岂马减于班乎?颜在谢先,而颜非谢比。元居白上,而元非白俦。宋张、韩、刘、岳,明边、何、徐、李,皆取便称谓,非远弗如。元虞、杨、范、揭差近,亦偶然耳。(胡应麟 158)

何谓“取其称呼之便”,又何谓“适齿牙”?让我们来看一看王安石提到的《世说新语·排调》中的那段颇有趣味的文字,其中有一把开启“问题之锁”的“钥匙”: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刘义庆 余嘉锡 791)

对这一问题,近现代学者中余嘉锡最早做出研究,认为“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穀、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刘义庆 余嘉锡 791—92)。余嘉锡的这一解说,得到了许多语言研究者的认同,由此王安石的所谓“取其称呼之便”、胡应麟的“适齿牙”也有了确解。所谓“便”也,“适”也,实际上就是古代汉语骈列的基本秩序和符合这种秩序的表达惯例。据此来看“王杨卢骆”的排列先后,“王杨”双声连绵,故置于“卢骆”之前,而“卢骆”以先平后仄,故“卢”前“骆”后。这种表述乃基于某种语言习惯,并非刻意,对此实在不必做优劣胜负的比较,而留下类似“驴宁胜马”之笑谈。

在余嘉锡研究的基础上,当代语言学家进一步总结了汉语骈列的词语和四声排列秩序,认为“在汉语里两个词并举合称的时候,两个词的先后顺序,除了同是一个声调以外,一般是按照平仄四声为序,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如果同是仄声,则以上去入为序,先上,后去、入;或先去,后入”(周祖谟 2)。

这个排列秩序是适用于解释唐代文学家并称(匹耦类)现象的。据此我们看到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的并称其数量确实极多,“城南韦杜,去

天尺五”的谚语中“韦杜”语序显然是唐代姓氏并称的主流形式,如“来李”(来济、李义府);“苏李”(苏味道、李峤,苏颋、李义);“王孟”(王维、孟浩然);“王李”(王维、李颀);“储孟”(储光羲、孟浩然);“卢杜”(卢象、杜甫);“萧李”(萧颖士、李华);“包李”(包佶、李紆);“韦柳”(韦述、柳芳,韦应物、柳宗元);“韩柳”(韩愈、柳宗元);“刘柳”(刘禹锡、柳宗元);“韩孟”(韩愈、孟郊);“韩李”(韩愈、李观);“元白”(元稹、白居易);“刘白”(刘禹锡、白居易);“姚贾”(姚合、贾岛);“牛李”(牛僧孺、李德裕);“温李”(温庭筠、李商隐);“李、许、温、杜”(李商隐、许浑、温庭筠、杜牧);“皮陆”(皮日休、陆龟蒙)等,可谓不胜枚举,甚至有舍姓而取其他代表性符号也合这种一般并称惯习的,如“燕许”(张说、苏颋,按:燕,国名,乌前切,平声)、“郊岛”(孟郊、贾岛)。至于上声在前,去(入)声在后的则自然以“李杜”(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沈宋”(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

当然,上述语言符号排列的秩序是一般的规则,并非严格的规定。且不说两姓都是平声的时候前后排序往往比较随意,如“钱刘”(钱起、刘长卿)或称“刘钱”;甚至平前仄后的顺序也非固定不变,如富家谟和吴少微以文辞以经典为本,且同官而友善,故齐名当时,然《旧唐书·文苑传》称“富吴”,《新唐书·文艺传》则称“吴富”。杜甫和韩愈,后人或称“韩杜”(杜牧《读韩杜诗》),^⑥或称“杜韩”(洪迈《容斋四笔·杜韩用歇后语》),都体现出较为自由的心裁。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语言符号的秩序是服从于心理文化定位的。换句话说,在有可比性,或级差有限的情况下,语言符号秩序自然发生作用,但如果文化影响(包括时间先后)迥然不同,则并称的顺序往往就由心理定位来决定。当然,评论者(或接受者)对人物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形之于并称,至于如何排序则取决于心裁。如老子和庄子,依“先平后仄”并称“庄老”者自然有之,《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论颇为古今熟知,但老子往往被认为是道家始祖,故尽管“老”为仄声,“庄”为平声,古来称“老庄”者似乎更为普遍。

如果说“老庄”或“庄老”尚有一定的相对性,“黄老”之谓,既合于言说秩序,又符合普遍认知,

就没有心裁的余地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显例是“屈宋”，“屈”不但早于“宋”，且文学成就亦远在“宋”上，因此虽然“屈”为入声，“宋”为去声，亦不循“先去后入”之一般规则，而以“屈”在前，“宋”在后，并一直为文学史家所通用。^⑨唐代文学家并称中，不由语言秩序而由心理认知决定的例证同样存在，如陈仅《竹林答问》论及“古诗入律句”问题，并称“李韩”（李白、韩愈）和“杜王”（杜甫、王维），李、杜之地位和影响自在韩、王之上，故其连文并称的顺序，就不以语言习惯为限了。

三、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唐代文学家并称

作家并称，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鲜明的本土传统文化的特色。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批评方式，乃在于“并称”的选择、类化、序列和阐释空间的扩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批评者（或接受者）的比较、选择、归类、理脉、存疑、推原、参照、责实、评说，使并称成为文学史的鲜明坐标，文学现象从混沌走向清晰，经典化进入过程，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

文学史构成的最基本要素是作家、作品，而作家是由创作活动和创作成果来证明其存在与价值的。古代文学史不同于现当代文学的是，对“作家”的认定相当宽泛，只要有创作活动和作品，都作为“作家”看待，就唐代而言，哪怕流传一首诗，乃至断句残篇；哪怕文献中仅仅记载过极为有限的文学活动，今天我们都将其作为“作家”。实际上，我们将对“作家”的判断交给了“时间”的选择和淘汰机制。应该说，“时间”的选择和淘汰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双重因素，其结果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对唐代文学演进的整体认识，但却不足以形成对唐代文学发展关键因素、本质特征和重要成就的把握。因此，回到唐代文学发生和后代文学接受的现场，去了解其时人们对文学家、文学活动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评价，内涵着选择的倾向，而并称则是比较结果的标志性显现。

并称作为一种语言秩序的表达与“类”的观念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优越，甚至感官属性水平上的分类也是通向理性秩序的第一步”（列

维-斯特劳斯 21），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是文字分类的原则，也体现了人类一般的类化性思维特征。唐代文学家的并称，从最基本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知识类化”，即衡量作家和作品，根据对象实例提取出某种共同特征属性，将单本（个体）组成若干种集合。那么，对唐代文学家比较、选择后的“类化”，主要有哪些方面呢？粗略分析（不排除相互间交叉的部分），大体有以下数端：

一曰时代，如垂拱四子、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二曰党派，如韦武、二王、八司马、牛李；三曰文体，如富吴体、沈宋体、燕许手笔、文章四友、韩文杜诗、孟诗韩笔、张王乐府、温李体、三十六体；四曰流派，如王孟、韩孟、姚贾；五曰风格，如高岑爽健、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卢李险怪、浑诗远赋；^⑩六曰阁臣，如十八学士、珠英学士、姚张（姚崇、张说）、权武（权德舆、武元衡）、三俊（李绅、李德裕、元稹）、三舍人（令狐楚、王涯、张仲素）；七曰交游，如王孟、王裴、储王、元白、韩孟、韩柳、刘柳、九老；八曰家族，如三珠树、三包、二皇甫、五窦、五宋；九曰地域，如北京三杰、吴中四士、九华四俊、江东三罗；十曰方外：方外十友、山中四友、竹溪六逸、僧中十哲、五僧、寒拾；另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以性情和品行并称的，如饮中八仙、芳林十哲。

知识类化，从思维特点上说，是将对象的某种相似点抽象出来进行一定的归纳，形成便于记忆的言说方式，它在将对象的各种内涵向一个方向敛拢的时候，降低了内涵的复杂性。然而正如符号学家池上嘉彦所说，“人类最初有要求输入秩序的欲望，但却不能容忍长久地安居于一个完全被秩序封闭了的世界。迟早人类还是被创造行为所驱动，尝试部分地或全面地改组原有的秩序”（池上嘉彦 6）。因此，我们看到当时人或后人对唐代文学家做出某种并称后，往往都会引起讨论和阐释。如果说形成并称是异中求同的话，讨论和阐释就是同中求异，前者多出于感知，着重的是知识抽象和普及；后者则较多出于论理，着重的是学术的具体和深化。一种有意味和意义的唐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由此显示出极大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建立了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坐标体系。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尝言“诗之有齐名者，幸

也,亦不幸也。凡事与其同能,不如独胜。若元白,若张王,若温李,若皮陆,一见如伯谐、仲谐之不可辨,令子产‘不同如面’之言或爽然;久对亦自有异,读者不可循名而不责实”(779-80)。说对齐名并称,“不可循名而不责实”,非常正确,但云“与其同能,不如独胜”,则显然未中肯綮。说到底,“并称”之“称”,实际上是一种“誉”,是对可以比伦的作家创作特点、风格、地位的肯定形式。试问,唐代文学史上哪一位重要作家完全“独胜”而没有与他人“同能”的素质,进而言之,哪一位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没有在某种视野中被并称过?从一定意义上说,并称正是经典化的前声,由其所建立起来的,正是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坐标体系,这一坐标连接出近三百年唐代文学演进的大致脉络,为深入研究唐代文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提出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唐代文学研究充满着争论,而争论的出发点往往即源于并称。并称作为经典的最初编码已内涵了问题意识,即包含了某种“理”,但“理一分殊”,研究“分殊”比概括“理一”更有益于文学史的深化。“分殊”就意味着不仅是“同向”的说明,即坐实其说;而且包括“逆向”的争议,即质疑陈说。虽然这双方面的讨论都不排除论者自身的偏好,有时甚至显示出强烈的自我审美意识,但总体上并无妨问题的深入。“李杜优劣论”可谓唐诗学上的一个典型例证。从某种角度言之,李杜的经典意义是在历时千年“孰优孰劣”的对立性驳难中得到逐步传播的,而当有学者发掘出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首先提出了“杜李”并称的文献史料,则中唐文学史之复杂性,以及尊杜之风形成的背景也随之得到揭示。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论诗诗,往往皆与唐代文学家并称问题有关,“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这种专题性、诗体式的论述,促进了唐代文学经典的形成。

(三)揭示了唐代文学家的多维联系。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文学家都不是一座孤岛,而是社会和文学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并称,既然基于比伦,亦即意味着对作家间某种关系的确认。如果我们将一个并称就看成一个“关系节点”的话,那么便可以在不同“节点”上还原作家的某种面貌。如李白,除了与杜甫并称“李杜”外,尚与孔巢父、

裴政、张叔明、韩准、陶沔并称“竹溪六逸”,与张旭、李适之、崔宗之等人并称“饮中八仙”,与陈子昂并称“陈李”,与杜甫、韩愈、柳宗元并称“四君子”……,每一个“节点”都体现出李白经历、性格、创作风格、文学地位的一个侧面,而综合考察其多维联系,则可对其人形成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另外,唐代作家的交游关系,乃至学陶派、韩孟派、苦吟派、晚唐派,以及河汾诗群、浙东唱和诗群、襄阳唱和诗群、东都闲适诗群等体派群体,亦皆据不同并称可以观照。

(四)折射了唐代社会和文坛风气。某类并称的出现和流行,往往是社会政治和文坛气候迁转的潜在的风向标。如唐初以“学士”作端语的并称频现,表明馆阁之臣在朝廷具有一定的地位,中晚唐馆阁渐衰,学士集团影响不彰,所出现的朝臣并称往往是党争的产物,而唐末“咸通十哲”、“芳林十哲”之出现,则可见科举制度腐败,文人精神走向堕落。从文学上看,对盛唐以降文学的评论,多见“陶李”、“陶杜”、“陶谢王孟”、“陶谢韦柳”、“陶白”之连文并举,可见效陶之风,山水写作自盛唐而渐盛,而五僧、僧中十哲、寒拾等并称的出现,表明中晚唐及五代,禅风兴盛,诗禅趋合,白话诗写作渐成风气,且江右诗僧颇具导源扬波之功。另外,通观全唐五代文学家之并称,地域类、家族类占有极大的比重,表明地域与家族作为文学创作现场,最贴近作者感知的经验,为文学家自身和研究者普遍重视。

由此看来,并称对于唐代文学来说,在语言符号秩序之外,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价、研究的价值。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而阐释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曾经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对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这当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是让人感到阅读、品味和斟酌的愉快,其中包括了对古人采取如此特殊方式时专注与随意共生的会心,也包括了对他们在进行种种优劣之争时严肃与意气并发的欣赏。

注释[Notes]

- ①这方面的论文可参读张珊:“并称探源——语言、文学、文化的多重考察”,《中国社会科学》5(2009);吴承学:“谈谈古人并称的先后次序”,《古典文学知识》2(1995);李福标:“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2002);柳菴:“文学史作家并称刍论”,《汕头大学学报》2(1993);张震英:“唐诗人并称现象论析”,《学术论坛》3(2009);周蓉:“唐末诗人合称现象及其与科举制度的附生关系”,《西北师大学报》3(2011)。
- ②所谓“等量齐观”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同意胡应麟的说法:“唐人品第最精,如杨卢、沈宋、王孟、李杜、钱刘、元白,即铢两稍有低昂,大较相若,故不妨并称也”。参阅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六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54。
- ③作家并称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之分,宽泛意义的并称包括列示人物名称的各种并举式叙述,而严格意义的并称是指将作者名称通过省减而高度符号化后的连文表达。本文“并称”的概念取后者的意义。
- ④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载:“汉称苏李,唐称李杜,尚矣。汉之李杜,唐之苏李,亦人所共知,博雅之士引证李杜凡数处,而有未尽者。以唐一代言之,苏味道、李峤外,苏环、李峤并为宰相,苏颋、李又对掌丝纶,咸称苏李,是唐有三苏李也。李白、杜甫外,杜审言、李峤结友前朝,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
- ⑤这里的例证参考了柳菴:“文学史作家并称刍论”,《汕头大学学报》2(1993):24-30。
- ⑥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相传之讹”条引《路史》,参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顾炎武全集》第十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870。
- ⑦这条材料首先为吴承学教授所引,见吴承学:“谈谈古代文人并称的先后次序”,《古典文学知识》2(1995):101-103。
- ⑧宋人将杜甫和韩愈并称,以“韩杜”为多,此一现象颇可研究。
- ⑨后人将“屈陶”并称者,如元代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一《陶诗注序》云“屈、陶二子抑都无聊,因其情每托之空言”,尽管论者有“是陶非屈”的倾向,但因为时代悬隔,“屈陶”之语序亦不循“先平后仄”的惯习。参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26-27。
- ⑩《诗话总龟》前集卷六《诗史》:“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又有李远以赋名,伤于绮靡,不涉道,故当时号‘浑诗远赋’。”参阅阮阅:《诗话总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6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曹丕:《典论》,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
- [Cao, Pi. *A Treatise on the Class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 方世举:《兰丛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Fang, Shiju.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Orchid Clusters. A Sequel to Poetry Commenta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omp. Guo Shaoyu. Annotated. Fu Shous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顾炎武:《日知录》,《顾炎武全集》(19),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Gu, Yanwu. *Records of Daily Knowledge. Complete Works of Gu Yanwu*. Vol. 19. Comp.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洪迈:《容斋续笔》,《容斋随笔五集》。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
- [Hong, Mai. *A Sequel to The Casual Writings from Rong Studio. Five Collections of Casual Essays from Rong Studi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 胡应麟:《诗薮·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Hu, Yingling. *Gems of Poetry: Additional Volum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胡震亨:《唐音癸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Hu, Zhenheng. *An Examination of Prosody in Tang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 [Levi - Strauss, Claude. *La Pensee Sauvage*. Trans. Li Youz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7.]
- 刘昉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 [Liu, Xu, et al. *The Old Book of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刘义庆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Liu, Yiqing. *New Tales of the World with Annotations*. Annotated. Yu Jiax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下转第102页)